

试论抗战前浙江省政府挽救农村副业的努力 (1931—1937)

——以蚕、棉、桐为例

余涛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抗战前浙江农村蚕、棉、桐副业在各种不利因素影响下处于衰落状态, 农民生活恶化。浙江省政府为应对危机, 挽救农村副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主要有: 推广优良品种增加农民收入; 组织农民成立合作社减轻中间商人剥削; 培训农村基层人员传播先进农技知识。在施政过程中既多管齐下又按步就班并取得初步成效: 推广区农民收入提高; 产品逐渐恢复市场信誉; 局部地区的农民生活得以改善, 农村副业危机得以缓解。

【关键词】浙江; 农村副业; 成效

浙江农村蚕、棉、桐是农民增加收入、容纳过剩劳动力的主要副业, 在农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浙江“全省七十五县中, 产蚕丝者达五十八县, 完全以种桑养蚕为专业者, 亦不下三十余县。每年计产生茧百余万担, 生丝八、九万担, 占全国丝茧总数三分之一”^[1](p164-165)]。“浙省产桐区计有三十六县, 分布于金衢严温等处, 每年产量, 约十五万担至二十万担之谱, 约值四百五十万元”^[2]。抗战前几种副业均处于衰落状态, 为挽救农村副业, 增加农民收入进而复兴农村经济, 浙江省政府采取一些列措施应对危机, 然而学界较少关注。笔者在梳理相关史料的基础上, 对这一问题加以分析。

一、危机: 抗战前浙江农村副业的衰落

20 世纪 30 年代在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影响下, 浙江农村副业急剧衰落, 衰落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市场丧失。日本加紧侵夺我国农产品海外销售市场, 以前中国独占海外蚕丝市场, 近年来日本丝业发展迅速, 我国逐渐受排挤。“我国销售美国之生丝, 不到五万包, 而日本竟销去五十余万包, 尚不及十与一之比”^[3](p1)]。浙江为华丝出口重要基地, 受其影响, 出口锐减。“本年浙属各地计有春茧, 共计五万余包, 连夏茧在内, 不过六万包, 较之往年, 减去十分之六”^[4]。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劫夺东北市场, 一二八事变破坏江浙市场的正常秩序。湖州在 1931 年前在北方丝绸销路尚好, “不料九一八后, 北方及东三省绸销大减, 绸价日落, 于是湖地之丝绸收入遂大为减少”^[5](p2)]。吴兴“湖绉至 1931 年九一八之变, 北销几绝, 1932 年一二八之变, 南销又受打击。时至今日, 斯业遂一蹶不振矣”^[6](p13)]。一二八淞沪战事发生, “丝市几至完全停顿, 濮镇绸销益为阻滞, 存货囤积, 以致机织停歇, 丝行绸庄亏蚀, 相继停闭者过半”^[7]。受此影响, 蚕茧价格, “最高时每担可卖八十元, 今则仅售二三十元, 说到丝价, 现在是一再跌为五百两, 前年最低时尚不满四百两, 每担约八九百两的茧本, 再加加工费用, 成本已在千两以上, 今所值仅及成本之半”^[8](p160)]。由于日本竞价倾销和武力劫夺, 华丝逐渐丧失了国际国内市场。

基金项目: 华中师范大学 2010 年博士创新基金一等资助项目《浙江农村副业研究(1911—1937)》, (项目批号 2009010184)

自然灾害打击。自然灾害加速农村副业的衰败,1934 年全省 75 县中,有 60 余县受旱,“综计今年浙省因旱直接间接之损失,恐在三万万之数”^[9]。富阳“去年受灾田地,占全县总额百分之七十”^[10]。棉花在刚发育期,没有水分,所以产量减少,“大概今年棉花收成只有十分之四五”^[11]。虫灾肆虐,为害农产。浙省产桐区共 36 县,分布于金衢严温处各属,每年桐油产量,约十五万担至二十万担,虫害以尺蠖最多。建德牌里牌外等乡各处山地所种桐树,去年(1933 年)夏秋二季,因尺蠖专吃桐叶,剩余桐果,均为空壳,无油可榨。“仅就庙外一乡计算,去年桐产之损失已在二千元以上,约占全收获量三分之二”^{[12](p185)}。天灾影响了棉、桐等农副产品的收成。

商人剥削。中间商人,利用直接生产者对市场行情的隔膜,或他们急需现金而进行不等价交换,农民对此抵抗力薄弱,如桐油的辗转运销就是层层剥削,农民将所产桐子售于油坊,油坊榨油后出售当地油行,由当地油行运销外埠油行,由外埠油行转售洋庄再运销外洋,在此过程中,又有小贩掇客及过塘行等中间人,运销步骤复杂,“更有预卖制度,即俗所称“桐子批”或“桐油批”,农民在未收获时,即将产品预先贱价出卖,所受剥削更甚”^{[13](p235)}。此“人祸”无形中也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副业衰败,导致农民收入锐减,生活急剧恶化。崇德和临近的桐乡、德清、海宁、吴兴诸县都以蚕桑业著称。在五年(1935 年)前,农民都靠蚕桑收入来维持他们的生活;这几年丝绸业急剧衰落,已迫使他们走向悲惨境地。“从崇德 280 户蚕桑业平均收入五年中锐减百分之五七这事实上,已可窥见一斑”^{[14](p125)}。

农民收入锐减,只有铲除桑树,茶树,改种他物,使浙江副业规模萎缩。吴兴“农户因感养蚕之损失,有掘去桑树改种绿麻,百合,生姜等他项植物者”^{[6](p10)}。平湖“多数农户将桑树伐去,改成竹园,以致全县桑叶产量较从前减少了百分之四十左右”^{[15](p84)}。以往嘉兴的大小农民,多有盈余;今日则全然相反,大多负债累累,茧业失败为主要原因。有少数田地的农家,因为不够一家开支,纷纷将田地出卖。农家的耕地,因归并或转让而起重大变化,结果是增加地主田产的数量。无路可退的农民只有卖儿鬻女或走向极端。浙西以蚕桑衰落,“去年也曾设有人市,夫携其妻,夫带其女,辗转呼号,论斤出售,与大旱时之西北,情形固无异”^[16]!在杭县“新桥附近,已有一家五口,因为无法过活,全家服毒自杀”^{[17](p90)}。

二、应对:政府挽救农村副业的措施

农村副业衰落,农民生活恶化,农村经济陷于危机,不仅不利于国民经济建设,而且危及到农村社会稳定。因此采取有力措施,化解危机,政府责无旁贷。

首先是良种推广。蚕业推广,浙江的蚕、棉以土种为主,土种不仅结籽少,且品质不如改良种,市场无销路,比较效益低,因此改良种取代土种并加以推广是浙江政府的当务之急。统制政策是实施这一计划的手段。1933 年秋建设厅为实施蚕业统制政策,划萧山为第一改良蚕桑模范区,分发同一系统蚕种,绝对禁止饲育土种,并普遍消毒与指导,该区计共发改良种约达十七万张,各地收成,每张蚕种结茧,约在二十斤左右,而以第一蚕桑改良模范区为优,因此建设厅组织管理改良蚕桑事业委员会,负责全省蚕桑统制。由建设厅向江浙两省择优选购,至秋期产销两方,一律统制,“计养秋种约四十四万五千余张,连同蚕桑场直接配发二万六千余张,共计四十七万二千余张,全省所产秋茧,概由建厅组织收茧委员会统制收买。查本秋总收鲜茧量计九万三千余担,较诸七年前蚕业推广,增加几达五十倍,可谓突飞猛进”^{[18](p184)}。

棉花推广,省建设厅以所种土棉,不适合市场需要,为适应时代需要,增加农村生产,并复兴农民经济,推广百万华棉与驯化脱字美棉,“本年各县推广棉田亩数,计百万华棉:萧山一万六千亩;余姚一万亩;杭县一万二千亩,共三万八千亩。驯化美棉:镇海三万十三亩;慈溪一万一百二十五亩;定海六千亩;余姚五千亩;海盐三千一百九十八亩;鄞县一千五百亩;上虞一千二百亩;七县共五万六千五百八十六亩。总计中美棉田面积为九万四千五百八十六亩”^{[19](p1230)}。政府通过统制政策发放种籽和收买产品,先从重点推广区试点后逐步扩展,推广过程有条不紊。

其次,在推广过程中,对农民施行技术指导。蚕业作为浙江农民主要副业之一,政府着力指导。在平湖将蚕桑改良区改为改进

区,以前为普遍指导,现在用养蚕合作社指导及指定蚕户为示范户,示范户为随时指定或蚕户请求,每指导所有五十户到一百户,每指导所以乡镇为单位。“指导方针以合作社为中心工作,春秋二季指导,指导工作为催青共育消毒,茧行亦在统制之列,指导时间春四个月,秋三个月”^[20] (p75594)。在嘉兴改良区为谋蚕农改进养蚕方法及便利指导人员指导,将全县划为若干巡回指导区,每一巡回指导区设指导员若干人,指导该区内蚕户养蚕事业,如蚕种保护,收蚁,采桑,贮桑,划桑,饲食,眠除,调节温度等,上蔭操茧等方法,均一一指导,“二十三年春期设巡回指导区六处(计余贤,南门,双桥,澄溪,新胜,新丰)。任用指导员廿二人,蚕户二一六〇户,指导蚕种一〇九六二张,每人平均指导蚕种六四四张”^[21] (p73929)。由于农民知识薄弱,对新品种性状不熟悉,若仍使用旧法来培育不能达到新品种的优质收益,因此,对农户进行指导是必要的。

再次,组织专业合作社。中国的传统农家经营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缺少相应组织与市场联系,小农在市场上的弱势地位,导致农民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组织专业合作社,不仅疏畅农村资金,防止高利剥削;而且便利农产运销,免除中间商人榨取,有益农家经济,因此,政府尽力推进合作事业,组织各专业合作社。蚕丝产额日趋减少,其故一为品质低劣,二为成本太重。“今组织养蚕合作社,已达一四八所,社员有三五二四人,合作养蚕与烘茧,工作集中,费用减少,成本自低,二十四年度各县市试办者,计有萧山、诸暨、海宁三县及第一合作实验区”^[22] (p190)。1936年,萧山、海宁、嘉兴三县联合社已在进行机器烘茧,准备大规模烘制,诸暨、杭县等处增设茧窑,增加收烘数量。棉花运销合作社,在浙江,棉花输入值百万元左右,“今余姚组织运销合作社,有社员八十七人,股金二百〇四元,产棉二千担”^[23] (p16)。由于政府的努力提倡,蚕丝、桐油、棉花等合作社数量增长很快,“截至本年十月底止,计已核准登记之蚕业生产合作社有二百二十三社,社员五千七百三十四人,股金一万一千九百五十六元,桐油生产合作社有五十六社,社员一千二百六十五人,股金一万五千四百八十七元,棉业生产合作社有二十一社,社员一千七百一十五人,股金六千七百零二元”^[24]。合作社的正常运转,资金供应是必需的,省建设厅与中国农工银行订约,向该行透支款项,向农民提供低利贷款。如桐油放款,放款额二十万元,各县农民银行根据商定办法,向中国农工银行直接订约贷款,如二十万元,不够支配,视地方情形,随时增加,运销贷款,并无限制^[25] (p66)。合作烘茧贷款,由浙江省励志信用合作社,中国农工银行,中国银行暨各县农民银行分别合作贷款,总额为三十余万元;贷放区域,计萧山五万元,海宁五万元,诸暨五万元,崇德五万元,吴兴四万元,新昌二万元。棉花贷款共为五十余万,月息八厘半,由上海银行与各县农民银行合作举办,贷款区域,计余姚四十万元,慈溪六万元,海盐三万元^[26] (p66)。合作组织+资金提供较为有效地解决了农民组织分散、生产资金缺乏的缺点。

最后关于产品品种,及各种专业人才的培训,政府也不遗余力。省棉场为了得到适合浙江自然环境的改良棉品种,年来进行各种育种比较试验。如中美棉标准品种比较试验。民国二十三年起,开始中美棉标准品种比较试验,一方以比较任何中美棉品种间差异,一方采知中美棉何者适宜,长丰棉纯系育种长丰棉自1933年加入品种比较试验以来,历年产量均超过对照(百万棉),故省棉场自1936年开始长丰棉纯系育种工作,期望得到优良品系,以资推广。

专业人才的培训,有利于农业技术的传播。如培养养蚕合作人员,第一改良蚕桑模范区为推进养蚕合作事业,增加蚕业生产合作社效能,举办合作社职员训练班,以训练养蚕技术及合作社实际主持人才;培训治虫人才,省昆虫局因感各县治虫专门人才缺乏,曾开办治虫讲习会,“于二十一年一月开办植物病虫害防治讲习会,到会者六十县,计七十四人,训练三周,讲授植物病虫害之防治知识。又于各县酌设特约治虫合作小学,至廿五年共达一百八十九所,规定课程由县政府供给教材及用品,并由县治虫人员巡回讲演及领导实习,以根本变更农民对于治虫之错误心理,从事实施工作之准备,先后设置者凡三十九县一百八十九所”^[26] (p136)。政府直接灭虫措施,减少农产物的损失,属治标;培养治虫人才,着眼长远,属治本,标本兼施以图救治。

三、成效:政府施政的回报

首先由于改良种优于土种,得到农民信赖,不仅推广迅速,而且市场售价高,农民收入增加,颇得实惠。就蚕种品质论,“近来改良种较土种缣折减少二三百斤,丝质统一,匀度增进,糙头减少,鲜舒优良,缣工费用较前减少四分之三以上”^[27] (p16)。改良种替代土种迅速。“本省原为土种区域,每年蚕汛收入仅百万元,自设会统制推广改良种后,已逐年增加,现将每年改良种收入如下:二十二年一百九十万元,二十三年三百三十八万元,二十四年六百五十万元”^[28]。改良棉品质优良,市场反应良好。花商纷纷竞购,建设厅为救济农民经济,准花商自由购买,花价因竞购关系,得以提高,农民多得实惠,以本年(1935年)浙江美棉已无余存。“棉农兴

趣甚高”^{[29] (p1139)}。以 1936 年各县推广实施区棉产情形为例,列表如下,以窥各区增收产量:

表 1 1936 年棉业推广增收产量表^[30]

项别 棉改良实施区	棉种类别	推广亩数 (亩)	改良棉平均 每亩产量 (斤)	改良棉籽 棉产量 (担)	土棉每亩 平均产量 (斤)	改良棉较土棉 每亩增收量 (斤)	全区总计 增收量 (担)
杭县	百万棉	12000	105	12600.00	95	10	1200.00
余姚	百万棉	11286	210	23600.00	200	10	1128.00
萧山	百万棉	15386	128	18694.00	102	26	4000.00
慈溪	美棉	10446	155	16191.00	130	25	2611.00
上虞	美棉	1400	150	2100.00	130	20	280.00
海盐	美棉	3198	150	4797.00	115	35	1119.00
镇海	美棉	30013	178	53423.00	145	33	9904.00
鄞县	美棉	2050	195	3997.00	160	35	717.00
余姚	美棉	3971	160	6353.00	150	10	397.00
定海	美棉	5000	150	7500.00	100	50	2500.00
总计		94750					23856.00

各县改种改良棉后,产量增加,总计“本年各区可增收二万三千八百五十八担,约合皮棉七千九百五十担,以每担价格五十七元计,则本年各区棉农收入,总计可增加四十五万三千一百五十元”^{[30] (986)}。棉农由土种更换改良种并在政府技术指导下,收入显著增加。

其次由于设立产品检验机构,进入市场的产品达到了标准,重塑市场信誉,恢复并扩大产品销售市场。如棉花验水所,浙棉在昔挽水极盛,浙省成立余姚与慈溪两棉花验水所,今改为实业部上海商品检验局宁波分处,宁波棉花检验事宜,由上海商品检验局宁波分处接办以来,检验棉花水分标准,今已递减至百分之十二,(即棉花百斤中,含水不过十二斤,)其他如搀石粉搀棉籽及浆包等恶习,经严厉取缔而大为收敛,故近年来由宁波出口棉花,“较前实有改进。”浙棉近年在市场上也逐渐恢复信誉,再次赢得市场。表现如下:“(a)浙棉(姚花)以前本为上海纱布交易所所摒弃,今则已准予在所交易,(b)以前浙棉在市场价格最低,今则已在汉口、天津、山东粗绒之上,据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本年二月一日所定棉衣等级表,天津粗绒定价,较标准价减四两七钱五分,汉口与山东粗绒均减四两五钱,而浙江余姚粗绒,则只减三两二钱五分,相差一两有余,(c)以前日本横滨长崎棉商,颇有向上海采购姚花者,因姚花花身日趋恶劣,该地销路亦渐断绝,今则以花身之改良,日渐恢复该地销路”^{[31] (p85)}。

最后,组织专业合作社,使农民由分散到联合,不仅减少了各种生产运销成本,而且免于中间商的剥削,不仅改善了农民生活,还活跃了农村经济。在桐油合作区,据调查浙江兰溪“组织桐油生产合作社,社员二十一人,社股计二百一十元,产桐油三千余箱,每箱二十二斤,共约七万余斤。以直接运销之故,每箱增加三元,共计增加一万元,是则每人每年增加五百元收入”^{[23] (p16)}。兰溪近因桐油价高,并有合作组织指导其经营,农行金融流通。金融宽裕,人民生计逐渐活跃,如“马涧及柏树社两镇商业情况,日趋繁荣,普通山农以玉蜀黍等充饥者,今都改用粮食矣,过去每逢时节,提灯演戏陋俗,已在经济困难中,无形停止,今又重演故态,农民经济的改善,于此可见一斑”^{[32] (p28)}。组织合作加资金供给,使局部地区副业生产活跃,农民生活好转。

四、结语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农村经济凋敝,浙江农村同样如此。社会各界不少人士提出各种挽救农村经济的主张。但农村建设千

头万绪, 从何开始一直是一个难题。且浙江地狭人稠, 据刘大钧统计浙江每人平均得田 2.1 亩。人均耕地面积与全国其他省比较, 见下表:

表 2 各省人均耕地表^{[8](p67)}

省区	京兆直晋热察绥	山东	江苏	江西	湖北	湖南	新疆	四川	云南
每人平均亩数	3.5	3.3	2.1	2.3	5.4	3.3	4.0	2.5	2.3
省区	陕西	奉吉黑	河南	安徽	福建	甘肃	广东	广西	贵州
每人平均亩数	3.0	6.8	4.2	5.0	2.2	3.6	2.5	6.4	0.7

由上表可知, 除贵州外, 浙江省的人均耕地面积最少。发展粮食生产先天不足, 且粮食作物经济效益低, 蚕、棉、桐等业是浙江农村的主要“富源”。浙江政府挽救蚕、棉、桐主要农村副业, 就是在寻找一把如何开启复兴农村经济这扇门的“钥匙”。政府在施政过程中, 既按步就班又机动灵活。如对开发桐油生产, 因政府财力有限, 就借助商人资本。对汉口桐油商人投资浙江桐油事业, 省府已指定兰溪, 金华两县桐油生产合作社为接洽商处所, 并命该县政府给予协助, 并负责保证投资安全, 若调查有适当公有荒地时, 由该商依照承办法规申请承垦, 或与该县当局订约共同经营^{[2](p11)}。这些举措使抗战前浙江农村副业危机得以缓解, 局部地区农民生活得以改善, 浙江省政府挽救农村副业的努力取得初步成效。

参考文献:

[1]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浙江省》,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 1933 年.

[2]《浙江改良桐油近况》, 《四川经济月刊》, 1936, 5 卷, 2~3 期.

[3]江家瑁:《浙江蚕丝业之衰落与改良之经过》, 《浙江省建设月刊》, 1933, 6 卷, 12 期.

[4]《浙皖丝茶产销概况》, 《申报》, 1933 年 7 月 15 日.

[5]《吴兴农村状况》, 《经济统计月志》, 1935, 2 卷, 1 期.

[6]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吴兴农村经济》, 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出版社, 1939 年.

[7]无庸:《浙江濮院之丝绸业》, 《申报》, 1934 年 6 月 21 日.

[8]蔡斌咸:《浙江经济建设中的农村副业问题》, 《实业部月刊》, 1937, 2 卷, 6 期.

[9]《浙省旱灾损失》, 《大公报》, 1934 年 8 月 19 日.

[10]《富阳农村衰落》, 《申报》, 1935 年 2 月 11 日.

[11]《杭县灾情》, 《大公报》, 1934 年 8 月 26 日.

-
- [12]《派员防治油桐虫害》，《浙江省建设月刊》，1934, 7 卷, 11 期.
- [13]《浙省桐油产销调查》，《国际贸易导报》，1936, 8 卷 5 期
- [14]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台北：文海出版社, 1935 年版.
- [15]吴晓晨：《浙江平湖的蚕桑业》，《新中华》，1934, 2 卷, 15 期
- [16]何冰：《农村经济破产中之农民》，《申报》，1933 年 5 月 1 日.
- [17]刘端生：《杭县皋城乡沿山居民的生活》，《中国农村》，1935, 1 卷, 6 期.
- [18]李化鲸：《浙江蚕丝业概观》，《浙江青年》，1935, 1 卷, 3 期.
- [19]《浙省推广植棉面积》，《农报》，1936, 3 卷, 23 期.
- [20]段荫寿著：《平湖实习调查日记》，萧铮：《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 144 册），台北：成文出版社, 1977 年.
- [21]钱承泽：《嘉兴实习调查日记》，萧铮：《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 44 册），台北：成文出版社, 1977 年.
- [22]唐翼泽：《十年来之浙江合作事业》，《浙江省建设月刊》，1937, 10 卷, 11 期.
- [23]陈仲明：《浙江生产合作事业之进展》，《浙江省建设月刊》，1934, 8 卷, 2 期.
- [24]伍廷颺：《浙江省经济建设之进展》，《实业部月刊》，1937, 2 卷, 2 期.
- [25]姚方仁, 方恁农：《一年来之浙江经济》，《国际贸易导报》，1937, 9 卷, 2 期.
- [26]蔡邦华：《十年来之浙江治虫事业》，《浙江省建设月刊》，1937, 10 卷, 11 期.
- [27]《江浙廿四年蚕丝业改进概况》，《四川经济月刊》，1936, 5 卷, 2~3 期.
- [28]《推广改良蚕种在浙试验成功本年需要二百万张土种蚕已渐形绝迹》，《大公报》，1937, 2 卷, 17 期.
- [29]《浙省改良棉全数脱售》，《农报》，1935, 2 卷, 32 期.
- [30]萧辅：《十年来之浙江棉业改良与推广》，《浙江省建设月刊》，1937, 10 卷, 11 期.
- [31]蒋学楷：《浙江省之棉业》，《国际贸易导报》，1933, 5 卷, 7 期.
- [32]蒋振球：《兰溪实验县桐油生产合作社概况》，《合作与农村》，1936, 8 期.